

## 張君勱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 (1919-1922)\*

潘光哲\*\*

張君勱(1886-1969)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角色是多樣性的。本文以比較精細的分析取向，以1922年為限，考述釋論早期張君勱對於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與思考，以呈現其特色。

本文分析的課題是：一、張君勱傾心於社會主義的思想轉折。二、張君勱認識社會主義的途徑。三、張君勱對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反省、思考和抉擇。最後，本文嘗試將張君勱在這個階段中的社會主義論，進行比較定位，認為他與批判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式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主義者考茨基(K. Kautsky)的觀點，頗為一致。他在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論，也預示他日後的社會主義論之內涵與立場定位：主張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巴力門之路(a parliamentary road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ism)。

關鍵字：張君勱、社會主義、考茨基(Karl Kautsky)。

---

\*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三屆張君勱先生思想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張君勱學會〔主辦〕，1995年3月12日)，會中得到江燦騰、薛化元、顏厥安及與會諸先進之指教，並蒙主辦單位允准，先行發表，均此謹致謝忱。謹將本文敬獻給顧紹昌先生，感謝他多年來對筆者進行「張君勱研究」的支持與鼓勵。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



## 一、導論

張君勱（1886-1969）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角色是多樣性的，對他的思想研究成果亦稱豐富，足堪參照<sup>1</sup>。綜觀張君勱之思想遺產，論及「社會主義」之課題者，亦洋洋灑灑，晚年且夫子自道云<sup>2</sup>：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可以說：我都一直置身於世界民主社會主義潮流之中。

不過，至今為止，關於全面解析張君勱社會主義論的內涵，述論其與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之關聯，評估其社會主義論之思想史定位的研究成果，卻未之見，堪稱學界一大憾事<sup>3</sup>。

從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的角度觀察，張君勱的社會主義論，實有其特色。對比於其他中國社會主義思想流派中人，他既有親身觀察既成社會主義體制的經驗，嘗試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多方面的反思，而且還曾進行實踐綱領的擘擬與策劃。去取之間，自有主張，別成一家之言。不論就認識張君勱思想，或就探析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運動言之，張君勱的社會主義論皆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本文不取通論式的作法，嘗試藉由比較精細的分析取向，以1922年為限，考述釋論早期張君勱對於社會主義體制的

<sup>1</sup> 關於1989年以前台灣「張君勱研究」成果的檢討，參見：潘光哲，〈近年來台灣地區「張君勱研究」之概況〉，《反思》第1期（台北：張君勱學會，1989年10月），頁5-37；此文發表後，筆者對「張君勱研究」的新成果，續有檢討，以評論兩部最新問世的張君勱研究專著：鄭大華，《張君勱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金若杰（Roger B. Jeans, Jr.），*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Politics of Zhang Junmai*（Carsun Chang），1906-1941（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為例，嘗試思考未來「張君勱研究」的恰當取徑，參見：潘光哲，〈「張君勱研究」前景的反思——以兩部新著為例〉，《新史學》第10卷第1期（台北：1999年3月），頁147-161。

<sup>2</sup> 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3。

<sup>3</sup> 目前研討張君勱社會主義論的成果，多屬通論性之作，比較新近的論著，不完全舉例，如：熊自健，〈張君勱的社會主義觀〉，收入：劉述先（主編），《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1-59、何信全，〈張君勱論儒學與民主社會主義〉，收入：氏著，《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學政治哲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151-172。

觀察與思考，以呈現其特色。但望能為今後繼續探究張君勱社會主義論的起步<sup>4</sup>。

## 二· 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張君勱傾心於社會主義的思想轉折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裡，社會主義思潮\運動，占有獨特的一頁篇章，其鼓吹一代風潮、帶動世局變易的影響力量，絕不容輕估。

清末以降，西方社會主義思傳入中國以來，其流佈態勢隨著中國人對其內涵之漸能掌握，益形廣泛與深入。就其流佈過程論，清末民初之際，孫中山之「民生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曾激起一時風潮，於辛亥革命前後成為關注的焦點<sup>5</sup>；「五四運動」之後，無政府主義雖再起波瀾<sup>6</sup>，然而，在

<sup>4</sup> 本文以1922年為分析斷限，係基於這樣的考慮：張君勱於1922年1月返抵中國，參加上海國是會議，並擬就《國憲議》（1922年3月）後，曾以「世界室主人」筆名著有《蘇俄評論》（上海：新月書店，1927），1928年，他與李璜等共辦《新路》，從張君勱社會主義論的整體發展脈絡來看，他在《蘇俄評論》及《新路》這份刊物上對社會主義體制（尤其是蘇聯）多所著墨，立論內涵大不相同，此後之述論更為豐富，甚而匯集成《史泰林治下之蘇俄》（北平：1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再版〕，1970）一書，不但可以成為進行張君勱不同時期之「社會主義論」（與蘇聯觀）的比較素材，也可以將之與同一時期其他中國知識分子（如胡適、丁文江等人）的「社會主義論」（與蘇聯觀）進行比較考察，以凸顯出張君勱的「社會主義論」（與蘇聯觀）的特色；後來，他在《立國之道》（桂林：1938；收入：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編印〕，《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台北：1976）之論議與觀察，也頗多可做精細檢討之處；中共政權建立後，自我流放於海外的張君勱，對中共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之內容，並及世界共產主義體制國家發展態勢，觀察述論亦多，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別有思慮，與初期之認識大不相同，如其《辯證唯物主義駁論》（香港：1958；收入：《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關於馬克思主義之理論即有較諸早期更為深入的探討，這些都是應當另行擊擬，分別處理的課題。至於張君勱在這個階段裡從倭伊鏗（R. Eucken）的因緣，鑽研哲學，進行個人「學問國之建設」的過程；並及他的政治主張裡以標舉「社會主義」為號召者，亦在本文探討的時間序列中就已露端倪（最清楚的標誌屢推：張君勱，〈懸擬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本文亦未涉及。總言之，本文實係一「小題大作」之文，實待方家君子教正之處必多，甚望不吝惠賜卓見，以為筆者更全面地探討張君勱的社會主義論的思想助力。

<sup>5</sup> 關於探討清末以降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流佈情況的論著，不可勝數，英文專書方面，若：Yu-ning Li,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歷史的進程中，馬克思主義躍上檯面，藉種種機緣，逐漸躍居優勢，終於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後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唯一依皈<sup>7</sup>。

在此一過程中，不論是何等派別，皆曾依其對社會主義之理解，創言立說，或贊揚之，或駁論之，或做為政治主張的基本綱領，或做為解決問

University Press, 1971)、M.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皆係通論早期流佈情況之作；「無政府主義」方面，可參見：R. A. Scalapino and G.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亦皆各有所論說；中文方面，皮明麻，《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彭明（主編），《從空想到科學：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都是難免意識形態之干擾的通論之作；「無政府主義」方面，可參見：路哲，《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胡慶雲，《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台灣本土並無研析此一課題的專書，多為論文集或學位論文，例如：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萬麗鵬，《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1895-1913》（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不詳舉。

<sup>6</sup> 參看：路哲，《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稿》，第7~9章。

<sup>7</sup> 關於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思想舞台上漸居優勢，並成為中共政權意識形態領域的唯一依皈之過程及其特色，涉及廣泛，學者各有立論。例如，李澤厚認為，民粹主義、道德主義與實用主義等因素在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發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因素；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又與現實鬥爭密不可分，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沒有取得思想理論的獨立發展形態等等因素，都在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此後之傳播及其意識形態作用的進程（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43-208）；金觀濤則以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傳統的結合是個很重要的因素（見：金觀濤，〈「河殤」的現代困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收入：趙耀東〔等著〕，《河殤討論集》〔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頁183-193）；又若美國學者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研究毛澤東思想而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也引發熾烈的討論（參見：侯且岸，《毛澤東研究史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176-183）。筆者無意在此全面羅列學界既有業績的各式論點（及其相關駁論），只希望顯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深思、探討的問題。

題之南針，並以各方之認識不同，主張不一，針鋒相對，論戰不絕<sup>8</sup>。

張君勱也在這樣一種寬廣的時代背景裡，經歷了傾心於社會主義的思想轉折。具體地說，張君勱在1918年底和梁啟超等人啓程至歐洲一遊後<sup>9</sup>，思想產生了整體轉變。在此之前的他，本是傾心於研究國際法與熱心於政治事務的。儘管，在這趟歐遊行程裡，張君勱曾經表示將告別「政治國」走向「學問國」，但是，事實上，他並未放棄如何解決現實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思索與努力<sup>10</sup>；甚至可以說，張君勱思想的民主憲政、新儒家以及社會主義三個面相，是在這次留歐期間方告成形的<sup>11</sup>。張君勱更以得地利之便，能一探俄國革命之景況，目睹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之作爲。伴隨著張君勱思想這一次留歐期間的整體轉變，社會主義概念也成爲他關於國家基本藍圖設計中的一個面相<sup>12</sup>。

本來，當1919年夏秋間，梁啟超和張君勱等在歐洲時，張東蓀即曾致函提醒他們：

世界大勢已趨於穩健的社會主義，公等于此種情形請特別調查，並

<sup>8</sup> 如「中國社會主義論戰」（192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19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1930年代初期、中期），乃至於如「托派」與受共產國際支配的中共中央之間的意見衝突，都是很明顯的例證；關於這些課題，站在中共立場提出初步分析的作品，可參見：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上海：生活書店，1937）；何幹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海：生活書店，1937）；關於中國「托派」的研究成果，參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中國「托派」成員之一鄭超麟對唐寶林此書有嚴厲的批評，見：鄭超麟，〈批評唐寶林所著《中國托派史》〉，收入：氏著，〈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第2卷，頁494-504。

<sup>9</sup> 關於梁啟超於1918年底招張君勱等人至歐洲一遊的原委與經過，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頁152-153。

<sup>10</sup> 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頁31-32。

<sup>11</sup> 薛化元，〈張君勱思想研究〉，頁72-73。

<sup>12</sup> 薛化元，〈張君勱思想研究〉，頁67-72；金若杰則以尋找「適合中國的西方模式」（Western Model for China）為概念來詮釋張君勱此行的思惟（Roger B. Jeans, Jr., *The Politics of Zhang Junmai*, pp. 27-53）。

搜集書籍，以便歸國之用<sup>13</sup>。

對社會主義理念頗有興趣的張東蓀，藉此回提醒，也確實引起梁啟超一行人注意社會主義，一時之間，對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潮、運動頗為傾心。1919、1920年間的梁啟超即對社會主義、對俄國革命、對列寧皆頗致贊辭<sup>14</sup>；張君勱亦復如是，對俄國革命與列寧一樣都有高度的頌揚之辭<sup>15</sup>。當然，後來梁啟超改變了觀點，非但不認為在中國有實行社會主義之需要，而且反對馬克思主義<sup>16</sup>。但是，就當時來說，梁啟超、張君勱傾心於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卻是痕跡歷歷的。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張君勱傾心於社會主義的思想轉折，開始重視社會主義思潮，有其特殊時代背景，是同1910年代那樣一個時代氣氛分不開的。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則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氣氛的產房。

就中國而言，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特別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在中國知識分子間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般的景勢和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認知，有相當的關聯。

首先，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由國民黨人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標題報導了這個消息。此後，有關的訊息在中國報刊上不斷出現，但因來源多是西方國家通訊社的報導，內容相當混亂，真假莫辨。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俄國革命局勢的穩定，中國的輿論才逐步地明確起來。像《民國日報》在1918年元旦的社論中即顯示他們無法理解「十月革命」的意義，因之提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政府何以會被顛覆掉，使俄國全國重蹈於無政府狀態這樣的觀點；然而，到同年5月間，其認識就逐漸往前推進了，如在報導中說：「俄

<sup>13</sup> 張東蓀，〈與〔張〕君勱、〔劉〕子楷、〔蔣〕百里、〔徐〕振飛四兄書〉（1919），見：丁文江，《梁啟超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1961），下冊，頁567；當然，那時的張東蓀自身本即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並在宣傳介紹方面頗有致力，參見：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118-165。

<sup>14</sup> 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90-195。

<sup>15</sup> 詳下。

<sup>16</sup> 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00-214。



國數千年之專制政府亦為提倡和平之列寧政府所推翻，行見東亞大陸將為民治潮流所充布……」，可見對俄國情勢認識轉變之一斑<sup>17</sup>。

就國民黨人來說，他們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獲致成功的訊息，感觸恐更為深刻，因其面對的乃是一個最現實而具體的問題：俄國與中國在同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俄國革命能迅速成功，然則，「辛亥革命」的結果卻不能令人滿意，這是為什麼？此外，由於「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的刊布，的確提供了一個「友俄」的心理基礎，使得比較早注意這一情勢的國民黨人，如戴季陶提出了「對俄國的事情，應該刻刻留心研究才可」的主張。由對俄國情勢的重視，再度研究往昔曾被當成論戰武器之一的，並成為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泉源的馬克思主義，無寧是相當自然的<sup>18</sup>。眾所週知，戴季陶就是參與中國共產黨建黨活動的人物之一，也還是第一批中共黨綱最初草案的起草人<sup>19</sup>。

正積極準備圖取革命事業之再起的國民黨人，對於俄國革命的認識與對馬克思主義的再接觸，歷經了一個轉變的過程；其他正參與新文化運動，衝破傳統封建羅網的知識分子亦然。

就以首先撰述觀察俄國革命論作的李大釗為例，他在1917年3月24日於《甲寅》日刊發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頌揚俄國的「二月革命」必會確立「自由政治基礎」，「於以知自由民權之大義，無論如何屈挫，終有時而昌」<sup>20</sup>。而後，他又陸續發表〈麵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自由與勝利〉等文<sup>21</sup>，甚至有撰作《俄羅斯大革命

<sup>17</sup> 參見：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76-179。

<sup>18</sup> 關於國民黨人此時評論俄國革命，重行接觸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一般狀況，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65-322。

<sup>19</sup>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頁32；綜合各方面資料討論戴季陶與中共建黨活動的記述，參見：范小芳（等），《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127-131。

<sup>20</sup> 李大釗，〈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收入：《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43-353。

<sup>21</sup> 均收入《李大釗文集》上冊。



史論》的念頭<sup>22</sup>。但是，此時李大釗的論點還不曾超越頌揚民主、自由，抨擊官僚政治與專制主義的範疇。就算在「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俄羅斯革命的理解，仍未嘗出現轉變的跡像。例如，他在1918年7月於《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雖然高度地評價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革命之采色者也」，並辨明革命後的混亂局勢只是暫時的；最後，他在結論中說：

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sup>23</sup>。

綜觀全文論旨，並未顯示李大釗已然開始認真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其意涵<sup>24</sup>。一直要到在幾個月後，他在《新青年》5卷5號同時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之後，才稍許透露出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訊息。

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分析了資本主義何以是歐戰的「真因」，並因此而深表贊同對抗資本主義之發展的俄國與德國的社會革命<sup>25</sup>；他在〈Bolshevism的勝利〉中則說歐戰戰局終結的真因，「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又說歐戰的意義是：

對於德軍國主義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

<sup>22</sup> 李大釗在〈大戰中歐洲各國之政變〉（發表於《言治》季刊第1號，1917年4月1日）的「附言二」中說：「俄國大革命，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變動，其影響於戰局〔指歐戰一引者〕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並吾國民主政治之遠命者甚鉅，因之國人對於此等變動研究之趣味亦愈濃。茲以付梓期迫而又限於幅秩，未能罄其所知以餉讀者，殊為遺憾。次期擬為有系統之專篇……題曰《俄羅斯大革命史論》，特此預告」。見：《李大釗文集》上冊，頁424。

<sup>23</sup>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李大釗文集》上冊，頁572-575。

<sup>24</sup> 參見：M.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nd. Printing]), pp. 63-68, esp. p.67。

<sup>25</sup>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冊，頁593-596。

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 (Wilson) 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 (Lenin)、陀羅慈基 (Trotsky)、郭冷苔 (Collontay) 的功業；是列卜涅西 (Liebknecht)、夏蝶曼 (Scheidemann) 的功業，是馬客士 (Marx) 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sup>26</sup>。

由此可見，李大釗已經初步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也可以看出他的認識還不夠真切，因為只要知道他稱贊的對象的生平歷程的人，就可明白李大釗的思想是混淆的，而且他也還不清楚領導「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sup>27</sup>。然則，李大釗熱誠歡呼「十月革命」的態度卻是顯然可見<sup>28</sup>。

至於一般知識青年的迴響，也相當熱烈。中共創始人之一，當時的北大學生張國燾就回憶說，除了他本人受李大釗啟發，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做比較系統的研究，其同窗如劉仁靜「埋頭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倡言「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羅章龍也表示：「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sup>29</sup>。基於這樣的淵源，日後的劉仁靜與羅章龍也都成為中共初期的重要領導者。在同一個時代氣氛下，即便日後政治立場與這批「左傾」知識青年大相逕庭的人物，在青春歲月裡，竟也深受感染。如晚年標舉「抗俄反共」大轟的傅斯年<sup>30</sup>，就學北大的青年時代，就曾表示：

一年以來，我對於俄國的現狀絕不抱悲觀。我以為這是現代應當有

<sup>26</sup>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冊，頁579-603；引文見頁598-599。

<sup>27</sup> 參見：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1卷上冊（台北：著者自印，1984〔再版〕），頁465。

<sup>28</sup> M. Meisner, *Li Ta-chao*, pp. 67-71, esp. pp. 68-69。

<sup>29</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頁84-85。

<sup>30</sup> 傅斯年晚年的「反共」立場相當堅定明白，以著述言，他在1949年來台後發表不少標舉「抗俄反共」大轟的文章，如：傅斯年，〈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自由中國》1：3（1949年12月20日）、傅斯年，〈我們為什麼要抗俄反共〉，《自由中國》2：4（1950年2月16日）、傅斯年，〈共產黨的吸引力〉，《自由中國》，2：8（1950年4月16日），不詳述。

的事情，將來無窮的希望，都靠著他做引子<sup>31</sup>。

他甚至說：

法國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過往的事；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sup>32</sup>。

凡此皆在在顯示，俄羅斯革命——特別是「十月革命」——爆發後的時代氣氛與思潮，在一時之間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sup>33</sup>。

從世界史的範圍來看，在191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產生思想的轉變，或對蘇聯頗有好感，更是相當普遍的一件事。

例如，早期的羅素（B. Russell, 1872-1970），即曾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激勵下，甚至激進到號召英國工人採取直接行動，在英國建立「蘇維埃」

<sup>31</sup> 原稿於此句字旁加「○」著重符號，引者以排版限制，改易為「\_\_\_\_\_」符號。

<sup>32</sup> 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1：1（1919年1月1日）；原稿文末署明繫年為「民國十一月十二日」，誤，應做「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本文未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sup>33</sup>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此時對俄國革命（與「十月革命」）的觀察與一時之間所受到的影響，筆者在此只臚列了少數人物的觀點，並不表示僅有他們才對此一課題有過議論（甚或產生個人的思想和立場變遷的結果）。事實上，尋探這方面的文獻，詳述論中國知識分子對俄羅斯革命（與「十月革命」）的觀察與他們所受的影響，猶有尚待史家翱翔的廣大空間。像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東方雜誌》，就連篇累牘地報導過俄國革命（與「十月革命」）的情況，也刊佈不少報導蘇聯共產政權成立後狀況的文章（參閱：三聯書店編輯部〔編〕，《東方雜誌總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1957〕），日後還集結成專書（例如：高勞、善齋〔合編〕，《俄國大革命記略》〔《東方文庫》之8，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東方雜誌社〔編〕，《勞農俄國之考察》〔《東方文庫》之9，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此外，如《新潮》、《太平洋》等期刊和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紙副刊等也都載有不少報導或評介文章（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1版，1979年第1次印刷〕；這套書附有「五四」時期主要期刊的文獻目錄，可供查考）。史家若繼續分疏各式史料，如呂芳上對國民黨人當時評論俄國革命，重行接觸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一般狀況，就有很好的整理與論述（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265-322），後繼者踵步繼之，當能對這樣的歷史情境提出更週到的論述觀點。

的地步<sup>34</sup>。又如匈牙利思想家，居「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源頭活水地位人物之一的盧卡奇（G. Lukács, 1885-1971）則回顧說：

只有俄國革命真正打開了一扇邁向未來的窗口；沙皇體制（Czarism）的傾覆，使我們瞥見了未來，而資本主義的崩潰，整個未來呈現眼前。當時，雖然我們對事實的認識，以及以這些事實為基礎的種種原理的知識，都非常有限，也很不可靠。儘管如此，我們——終於！終於！——還是看到人類擺脫戰爭與資本主義的出路了<sup>35</sup>。

可以說，在1910、1920年代世界性的波濤洶湧的社會主義思潮浸灌下，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轉變了他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觀點，乃至於藉以提出改造生活處境的實踐綱領。相當明顯的，張君勱也正是其中之一的弄潮兒。

不過，對比於國民黨人或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張君勱並不像他們一樣迅即轉換思想觀點，或是產生企圖迅即付諸行動的意欲，而是透過實際的觀察、研究與反覆的思索，始告確立其己身將社會主義納入關於國家基本藍圖設計的面相。

綜觀張君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理解過程，可以說是不斷地透過實際的觀察、研究與反覆的思索過程。他嘗試釐清社會主義理念對處理人類生活世界\公共事務的意義，並及對中國未來前途所能起的作用，終於，確立了他自己的立場所在：反對蘇聯式社會主義，而以威瑪德國為其典範。

### 三·張君勱認識社會主義的途徑

在張君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理解過程中，他的憑藉與途徑，主要來自於他和德國社會黨人的交往經驗，以及文獻的閱讀、思考，和中國其他知識分子走上社會主義之路的方向與過程，有異有同。

<sup>34</sup>參見：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164-166。

<sup>35</sup>G. Luká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by R. Livingstone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1), p. xi; 中譯文曾參考：陳璋津，《科西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台北：森大圖書有限公司，1987），頁25。

### (一) 張君勱和德國社會黨人的交往經驗

張君勱和德國社會黨人的交往經驗，提昇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認識。據其自述，他和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居一席之地的鉅子如：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8；張君勱譯其名為哥孛基) 等人，都有接觸與交往。這些人物向他提供了許多訊息，帶來許多思想上的刺激，對形塑他的社會主義觀點，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張君勱自述說：

遊德之日，訪哥孛基氏 (Kautsky) 於病榻，時氏反對俄國專政之文已發表，一見面便告我曰，異哉彼等乃以我為叛徒也，予年已老，對此剝奪人民自由之蘇維埃制，決不能贊成<sup>36</sup>。

透過考茨基的介紹，張君勱又得到與「獨立社會民主黨之理論家」，時為「《自由報》主筆」的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張君勱譯其名為希爾孚亭)、以及「獨立黨之外交專家」並任國會議員的布賴特沙伊德 (Rudolf Breitscheid, 1874-1944；張君勱譯其名為勃蘭脫夏特) 的晤面機緣。此外，他又曾會晤「修正派首領」柏恩施坦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張君勱譯其名為勃恩斯太)，會談時，彼「甚憤激於巴黎和約之不公，以歐洲社會主義之實行為無望」<sup>37</sup>。張君勱又會見了「多數社會民主黨」謝德曼 (Philipp Scheidemann, 1865-1939；張君勱譯其名為夏特曼)，會面時談及「社會所有問題」，謝德曼告訴他，「純粹沒收一切生產工具絕不可能」，「純粹之社會所有，決不能行，公私合辦之方式，其庶幾乎」，「德國在經濟上惟有走上公

<sup>36</sup> 張君勱此處所謂考茨基「反對俄國專政之文已發表」，應指考茨基《論無產階級專政》(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一書，1918年在維也納 (Vienna) 出版，部份英譯收入：Karl Kautsky, ed. and trans. by P. Goode,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p. 98-125, 全書中譯見：鄭學稼 (譯)，《論無產階級專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 [4版])。

<sup>37</sup> 張君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新路》，1：5，頁21。

私共有之途徑」<sup>38</sup>。張君勱也結識了柯西(Karl Korsch, 1886-1961; 張君勱譯其名為高休)<sup>39</sup>，由彼處獲知加入第三國際的德共採暴動手段奪權卻未得第三國際支援，甚至為第三國際所誤，也成為日後張君勱批判共黨採暴力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依據<sup>40</sup>。

張君勱接觸、交往的這些人物，在現代歐洲(德國)社會主義\馬克

<sup>38</sup> 張君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頁21；張君勱，〈立國之道〉，頁193。

<sup>39</sup> 張君勱對與柯西的認識過程的回憶，詳略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其經過如下：時地在1921年春的耶那(Jena)，原因是他對德國〈工務會議法〉頗感興趣，乃向時在耶那大學任教的柯西請教(見：張君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頁24-25；〈我之俄國觀〉，《再生》，1：7，頁6-7；《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4)；但張君勱之〈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形〉一文(《改造》3：9〔1921年5月15日〕)，文末署明：「11月巴黎」，並有一段似為《改造》編者附加之按語：「(法律譯文下期續登)」，而〈德國工務會議法法律譯文〉即連載刊於《改造》3：10~11(1921年6月15日、7月15日)，是則此文及〈工務會議法〉全文之中譯，當係成於1920年11月；何以張君勱於1921年春仍需向柯西請教此法乎？若謂張君勱於〈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形〉一文文末曾加「(附識)」一段文字云：「下筆時最感困難者莫若名辭之不統一……(下略)」，顯示他對此法內容的理解頗感困難，經柯西指教後而更熟稔此法之內容乃至修正譯文，然查考《新德國民主政象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一書第4篇〈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況〉(頁241-303)中對此法之敘述及法律全文之譯文，與刊佈在《改造》時完全一致，甚至「(附識)」這段文字亦完全相同(惟刪去「11月巴黎」一段)，是則張君勱就此法向柯西請益，似未對其有所助益，二人之結緣，所為何來，頗成懸案。

<sup>40</sup> 張君勱對此事之回憶，詳略亦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其經過如下：柯西時為耶那德共首領，於1921年3月暴動失敗後告張君勱云，其敗係為第三國際所誤(張君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頁24-25；〈我之俄國觀〉，《再生》，1：7，頁6-7；《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4)；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又云：柯西於日後「曾以左黨資格，為丟林根內閣總理一次，而近年則退出共產黨矣」；在此文及〈我之俄國觀〉中，他並皆述及德共領袖李維(P. Levi)經此事後曾著書批判第三國際；查考鄭學稼《第三國際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上冊，頁467-481)、貝爾托特(等編寫)，孫魁(等譯)《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2卷——從1917年至194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06-109)關於「三月暴動」之記述，則張君勱之回憶大體上是與這些資料是一致的；但關於柯西「曾以左黨資格，為丟林根內閣總理一次，而近年則退出共產黨矣」之論，可補充如下：柯西於1923年10月擔任圖林根省之司法部長一職，後於1926年被德共開除黨籍(參見：陳璋津，《科西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頁160-162，頁265；不過，陳璋津此書並未言及柯西是否參加、領導1921年3月耶那地區的行動)。

思主義史上，都自有一席之地<sup>41</sup>。在此之前，張君勱已經耳聞過部分人物的名聲<sup>42</sup>，與他們接觸、往來的經驗，一方面讓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與理解，有第一手的憑藉，另一方面則對他自己的立場抉擇產生作用。若與當時也傾心於（廣義）社會主義理念的中國其他知識分子，略做比較，我們更可以發現，張君勱經驗的獨特性。

大體而言，當時也傾心於（廣義）社會主義理念的中國其他知識分子，認識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各因出身、教育背景的差異，或是因為生活經驗乃至語文能力的限制等等因素，大有不同。有的人，透過日本的轉口，開始栽植個人社會主義理念的種子<sup>43</sup>；有的人，得到親身在「十月革

<sup>41</sup> 考茨基、柏恩施坦、希法亭、布賴特沙伊德與柯西，都是歐洲（德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史上的鉅型人物，研討成果繁多，他們的生平小傳、主要著作和研究成果，R. A. Gorman主編的兩部「（新）馬克思主義者」傳記辭典都有專條記述與列舉：R. A. G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R. A. G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謝德曼則曾於1919年2月13日至6月21日擔任德國總理，因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而去職（參見：埃里·希艾克〔著〕，高年生〔等譯〕，《魏瑪共和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頁66、101-103）。

<sup>42</sup> 張君勱說，在與梁啟超於1918年12月遊德時，梁囑其開列在德應見諸人之名單，那時他開列的名單上已有「社會黨領袖」考茨基及「前總理」謝德曼等人（見：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改造》，4：5，頁1）。

<sup>43</sup> 例如，李大釗在引介馬克思主義時，徵引馬克思著作（如《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以敘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領」時（見：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冊，頁55-59），而在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時他曾聲明說：「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雖未知是所有徵引的馬克思著作，還是僅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譯文從河上肇；但不管如何，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路上，顯然是讀過河上肇的作品的；又如郭沫若思想轉向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很重要的表記，是他在1924年春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而河上肇（1879-1946）在對中國知識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中，是作用最大，影響最深刻的一位；他的著作有不少中譯，為勢頭方起的馬克思主義的流佈與開始萌發的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理論武器（參見：鄭學稼，〈河上肇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收入：氏著，《中共興亡史》第1卷下冊，頁861-876）；又，李大釗雖曾在1924年時有過到蘇聯的經驗（參見：李玲，〈1924年李大釗逗留蘇聯期間若干史實摭述〉，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史料研局〔編〕，《李大釗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367-380），但那時的李大釗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命」後俄國的生活經驗，就此走上為社會主義理念獻身的道路<sup>44</sup>；有的人，和張君勱一樣得到留歐的機會，廣獲資訊，飽受刺激，開始以社會主義為理想<sup>45</sup>；有的人，雖然只能透過中文資料認識社會主義的理念，卻也大受啓發，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加入了「革命行列」<sup>46</sup>。相形之下，張君勱在歐洲和社會主義者的交接往來，這種生活經驗所帶來的思想刺激，是個很特殊的例子<sup>47</sup>。

## (二) 張君勱對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在做為研究與認識社會主義之憑藉的文獻資料方面，張君勱也投注相當大的心力。

張君勱在1920年1月即自德國得到了蘇聯憲法，同時也得到《威瑪憲

<sup>44</sup> 如瞿秋白在1920年時應北京《晨報》與上海《時事新報》之聘，赴蘇聯考察，待到1922年12月才離開，在這段留蘇歲月裡，他成為中共黨員，「參加革命」。相關論述甚眾，如：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92-148、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111-252，不詳舉。

<sup>45</sup> 如蔡和森在法國「猛看猛譯」各種關於「世界革命運動之大勢」等作品，讓他產生「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的觀點（見：蔡和森，〈蔡林彬〔和森〕給毛澤東〉（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49-50）。

<sup>46</sup> 如毛澤東說，他在1920年時，讀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與英國人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受到的「影響尤其深刻」，讓他「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雖然，毛對讀到這三部書時間的自述，並不確切，但是，並不該因此就否認這三部中文資料對毛澤東的影響（參見：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頁269-278、汪澍白，《毛澤東早年心路歷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54-258）。眾所周知，毛澤東不懂外文，傳統中國文化思想對他的影響力更大，中國學界對於這方面已有豐碩的討論（例如：丁曉強，《近世學風與毛澤東思想的起源》〔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即是箇中佳作，不詳舉）。

<sup>47</sup> 關於分析、辨別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認識、理解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筆者限於聞見，目前還不曾發現詳盡與客觀的研究成果。筆者在此提出的初步比較，自是粗略的描繪。當然，筆者之述論是否恰當，自必待學界先進批駁教正。

法》的定稿與憲法起草者柏呂斯(H. Preuss, 1860-1925)的原稿,攬以歸法<sup>48</sup>,陸續翻譯出來,刊佈在《解放與改造》上<sup>49</sup>。對於德國戰後時局變易的觀察,如對〈工務會議法〉、〈煤礦所有法草案〉等等在他看來是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典章的探討<sup>50</sup>,顯然也是對他自己的社會主義觀點抉擇產生作用的依據。

從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的敘述與分析來看<sup>51</sup>,大體上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歷程符合;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持行動綱領的解說與翻譯,也顯示張君勳確曾對投注心力於理解德國社會主義傳統,他的認識與理解,和中國別的社會主義宗派(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同的<sup>52</sup>。他對德國戰後各派別社會黨之間錯縱複雜之情勢也有相當的理解<sup>53</sup>,並能指出

<sup>48</sup> 張君勳,〈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頁20-21。

<sup>49</sup>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解放與改造》,1:6;〈德意志國憲法全文〉,《解放與改造》,2:8。

<sup>50</sup> 張君勳,〈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形〉,《改造》,3:9;〈德國工務會議法法律譯文〉,《改造》,3:10-11;〈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

<sup>51</sup> 張君勳將第一次大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分為三期:「培養時期」(1848-1871)、「鍛鍊時期」(1871-1888)、「長育時期」(1888-1914),在其述論中,若俾斯麥(O. von Bismarck)推動的〈反社會黨人法〉(the Anti-socialist law)對德國社民黨之影響均有述及,可見其確曾對此一課題頗有了解(但也有些錯誤,詳下),見:張君勳,〈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2:3,頁12-22。

<sup>52</sup> 例如,張君勳即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891年通過的《愛爾福特綱領》(the Erfurt Programme)全文譯成中文並再三致其贊佩之意(見:張君勳,〈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2:3,頁18-22);而《愛爾福特綱領》基本上是由考茨基擬就的,在當時由於受到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的影響,考茨基被視為是「無產階級的叛徒」,如蔡和森即說考茨基「染了有產階級唯理主義的毒」,其觀點「真是為資本家說法」,鄙夷之情顯然可見(見:蔡和森,〈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頁64);然則,相對於列寧主義意義下的馬克思主義正統,考茨基在1917年以前也曾經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參見:L. Kolakowski, trans. by P. S. Falla,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and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II, ch. 2, "German Orthodoxy: Karl Kautsky", pp. 31-60),「馬克思不復生,孰定其真偽哉」!張君勳對於德國社會主義傳統的理解,和蔡和森等顯然是不同的。

<sup>53</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社會黨分裂了,大致上,除原先的社會民主黨外,另有獨立社會民主黨(1917年4月成立)與共產黨(又稱斯巴達克同盟;1918年12月)。立場各異,在獨立社民黨看來,社民黨是資產階級的幫兇,居然喊出「保衛〔威瑪〕共和

各派別之間不同的主張差異<sup>54</sup>，更都在在顯示他投注的心力。

就1919年底、1920年初的張君勱對馬克思主義之理解與認識來看<sup>55</sup>，雖然未必有比中國其它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更為深切的認識<sup>56</sup>，但他確曾注意留心相關的問題與文獻，並隨時間之進程而漸有比較初步的理解與認識。

國」的政治口號：獨立社民黨雖有要將俄式蘇維埃體制入憲之主張，卻也被德共認為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夠堅定，不朝建立「自由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方向努力的黨。本文不詳論彼此立場觀點差異，參看：曹長盛（主編），《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而張君勱對各黨對立之情勢所做的述論，見：張君勱，〈德國革命論（續）〉，《解放與改造》，2：4，頁25-30。

<sup>54</sup>如張君勱即指出獨立社民黨要將俄式蘇維埃體制入憲之主張與社民黨不同，他亦摘譯獨立社民黨成立時的主張，見：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11-12。

<sup>55</sup>張君勱在〈德國革命論〉敘述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時談到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文刊於《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3期（1920年2月1日出版）時，文末署明「11月8日德國革命紀念日」，是則此文所述，可代表張君勱於1919年底、1920年初對馬克思主義之理解與認識。

<sup>56</sup>在此時張君勱談及馬克思主義時，他的理解僅止於視馬克思是德國社民黨「開山之祖」之一，恩格斯「亦為德社會主義之原動力」，他知道馬、恩曾共撰《共產黨宣言》「以喚醒各國勞動者，不分國界，聯合抵制資本家為目的」，知道馬克思著有《資本論》「各國社會黨奉為大經大法，猶耶穌〔穌〕教徒之視聖書，孔教徒之視四書五經也」，也知道馬克思創建了「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I. W. W.〕；張君勱譯為「國際勞動協會」）；但他亦將拉薩爾（F. Lassalle, 1825-1864）視為德國社民黨另一位「開山之祖」，還說他被「尊為德國社會主義之祖」（見：張君勱，〈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2：3，頁12-13）；但在這兒談及馬克思主義時，不曾顯示他讀過馬克思原典的景象，他也顯然不清楚馬克思與拉薩爾間的意見對立情形；對比於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已經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原典（參見本文註43），《共產黨宣言》更已有陳望道（1890-1977）譯出的中文全譯本（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1920年8月），銷路甚佳（參看：鄧明以，〈共產黨宣言是怎樣傳播到中國來的〉，收入：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4-16），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對成長中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毛澤東）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參見：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頁448-454），因此，張君勱早期對馬克思主義之理解與認識，未必是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深切的。

由於對蘇聯情勢之關心，張君勳在1920年初<sup>57</sup>，閱讀了英人朗塞莫 (Arthur Ransome) <sup>58</sup>《六星期之俄國》(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一書。據其所述，此書為朗塞莫於1919年遊俄居四十餘日後完成，「所記皆其當局及各領袖之談話」，其「讀而愛之，乃自定次序，分段擇譯」，並增加對俄國人物與政府政策來歷之說明，刊佈於《改造》<sup>59</sup>；他又以《六星期之俄國》一書未提及紅軍，故另取馬龍 (Colonel Molone) 之《俄共和國》一書讀之<sup>60</sup>。張君勳在譯介朗塞莫〈讀六星期之俄國〉一書論及「蘇維埃」時，即引譯了列寧《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 一書的部份段落<sup>61</sup>，這比中國共產黨人摘譯此書，至少還要早上將近一年半的時間<sup>62</sup>！

後來，至遲至1921年7月，張君勳在對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的討論中<sup>63</sup>，顯示他知道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論式：「以世界一切現象之變遷，推本於生計之變遷」，但是，他對這樣的論式卻明白表示了反對

<sup>57</sup> 按，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分兩篇刊佈在《改造》3：1~2（1920年9月15日、10月15日），刊佈在《改造》3：1時文末署明「二月八日巴黎」，參照張君勳〈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一文（《解放與改造》，2：14〔1920年7月15日〕，頁6），負責《解放與改造》編務的編者（疑為張東蓀）有這樣一段話：「編者按〔〈讀六星期之俄國〉〕此稿早已寄來，因多積稿，尚未發表」，是則可證明張君勳讀朗塞莫《六星期之俄國》此書當是在1920年初。

<sup>58</sup> 《改造》原文誤為「Rausome」。

<sup>59</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63；不過，早在1919年11月12日起至1920年1月7日止，《晨報》副刊即連載過Arthur Ransome的〈一九一九年旅俄六周見聞記〉，譯者署名「兼聲」（見：〈“晨報”（第七版）副刊分類目錄（一）〉，《五四時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頁486）。

<sup>60</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2，頁57；然張君勳於此未說明馬龍《俄共和國》一書原書名為何，僅云馬龍為英國國會議員，受英國政府命與蘇聯進行秘密交涉，曾由托洛斯基率之視察各戰線，歸英後著此書，「亦一小冊，與朗〔塞莫〕氏書相類也」。

<sup>61</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2，頁52-53；按，張君勳讀譯之列寧《國家與革命》，究係原書亦或朗塞莫《六星期之俄國》一書所引，殊難得知。

<sup>62</sup> 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在黨內秘密刊物《共產黨》第4號（1921年5月出版），方始刊出《國家與革命》一書的摘譯，參見：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133。

<sup>63</sup> 張君勳之〈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一文刊於《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年7月15日出版），雖不知撰述此文的确切時間，但必不晚於1921年7月。

之意，他論證的依據正是社會主義革命不先起於英、美等國而卻先在俄國爆發<sup>64</sup>！在這兒，也顯示出他似乎讀過《共產黨宣言》原典的痕跡<sup>65</sup>。他說，在馬克思的時代，沒有「社會所有」一辭，而常以「國有」一辭代之，他的依據是《共產黨宣言》中有述及關於最先進的國家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改變生產的社會關係的辦法<sup>66</sup>。但是很難說他在此時曾通讀《共產黨宣言》全書，單從他向來反對列寧式的暴力手段實行國有的觀點來看<sup>67</sup>，《共產黨宣言》在這兒的脈絡中，可是明白提出「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暴力的干涉」，而後才談及最先進的國家中可採取的各種改變生產的社會關係的方法。

因此，即使這個時期的張君勳，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式已有所知，或許也曾讀過馬克思或列寧的原典（乃至摘譯之），但不能說張君勳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是高明的<sup>68</sup>。

總觀這個階段裡張君勳認識社會主義的途徑與憑藉，雖然和其他傾心於社會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透過對文獻的閱讀、譯介與思考，產生了思想、立場上的轉換；但也有相當的差異，尤其以在歐洲和社會主義者的交接往來這種經驗，更為他人所未及。張君勳與其他人的思想轉變機緣相較，有一定的差別，彼此間不同的認識與途徑與憑藉，也當能為解析他們的社會主義立場與觀點所以南道北轍、互有出入的因原，提出另一個面

<sup>64</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4。

<sup>65</sup> 張君勳說《共產黨宣言》是1841年發表的，不確，應是1848年。

<sup>66</sup> 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最先進的國家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改變生產關係的辦法，一共列了10點（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489-491），張君勳在此文中只摘譯了5點（分別是第1點、第4-7點；見：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8），而其摘譯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譯文亦有相當的出入，文長不摘引。

<sup>67</sup> 詳下。

<sup>68</sup> 日後的張君勳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即頗表重視，甚費心力，最具體的表徵即是《辯證唯物主義駁論》一書之作。

向的思考<sup>69</sup>。

#### 四·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

在這個階段，張君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他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多所反省、思考的依據，非單終於呈顯了他己身的立場所處，並及申論社會主義對中國的意義，提出立論和行動綱領。

##### (一) 對社會主義理論意義的整體理解

整體來說，張君勳在這個階段對於社會主義理論意義之理解是，社會主義是一種解決人類文明發展趨於「多而不均，富而不安」這種特殊極端現象的理想、思惟與體制<sup>70</sup>；並且，由於他自己的認知與對中國現實處境的思索，他尤其突出地呈顯出一種企望「調和」的觀點<sup>71</sup>。

張君勳在述論俄國革命後的情形時指出，正由於歐洲社會黨人對「勞動狀況」長久以來不滿，將「政治上之帝國主義」、「社會上之資本與私有財產主義」視為痛苦根源的觀念，已深入歐洲人心，是以「俄國過激派」（即布爾什維克黨人）「振臂一呼，以試驗其主義於俄國，於是與之作桴鼓應者，遍於全歐」。所以他對俄國過激派之列於憲法條文的主張：「勞動為人人共有之義務」與「排斥歐洲列強之侵略政策」皆表「服膺」，因為行前者「可以去遊談坐食之輩，號為讀書君子，稍知勞力之苦，庶不以小民生

<sup>69</sup> 當然，筆者此處的論議絕對不是說傾心於社會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彼此間不同的認識途徑與憑藉，是造成他們立場與觀點上的差異的唯一因素；筆者認為，透過知識分子認識社會主義的途徑與憑藉的解析，當會讓我們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流佈與景況，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做出更好的評估；否則，盡是述論某某知識分子翻譯了什麼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發表過那些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等等，那麼，我們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意義的理解，恐怕必然永遠只能停留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資料尋覓過程和「剪刀與漿糊」的資料整理階段罷了。

<sup>70</sup> 張君勳，《國憲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81-86。

<sup>71</sup> 張君勳從社會主義角度對中國現實處境的思索與規擬，暫存而不論。

命爲兒戲」，而後者可使人類免於再陷於世界大戰之局，「此二端者，真人類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塗轍也」<sup>72</sup>。張君勱明白表示社會主義可以作爲一種解決人類文明某種危機的理想。

所以，他對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主義革命有這樣的評價，不足爲奇：

吾求之世界歷史，其足以與宗教改革，法國革命鼎足而立者，其惟俄國兩年以來革命後之社會主義之試驗乎？此兩年來之流血費財，亦猶宗教改革，法國革命之流血費財也。彼俄人以不惜此勞動，爲世界人類創新局面，其不安故常，推倒一世之慨，雖千百年後，猶令人追思……<sup>73</sup>

一時之間，傾倒之意竟若此境<sup>74</sup>。

## （二）個體與群體的思考

張君勱更嘗試從哲學人類學的思考，提出從對人的價值與第一義的肯定：「世界一切活動，以人類之幸福爲前提」，以此爲出發點，確認工人作爲人的價值，使他清楚地述論，經濟的發展雖是人類文明必然之勢，但「工商之發展，要必以社會倫理相調和」，所以站在社會主義「追求公道」的立場上，他反對爲了追求富強卻犧牲工人，「以奴隸牛馬待之」，作爲代價<sup>75</sup>。

既然肯定人的價值，但是，個體與群體（社會\國家……）間的衝突，在所難免，社會主義做爲一個以追求「社會公道」，以群體爲主要思考對象\判準的理想，在實踐過程中恐將具體地呈顯個體與群體間的矛盾，該如何因應？選擇判準何在？

張君勱對這個問題的意識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由比較混亂的思索而

<sup>72</sup> 張君勱，〈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頁40-41。

<sup>73</sup> 張君勱，〈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63。

<sup>74</sup> 當然，這並不是說張君勱對於俄國革命後的作爲全持肯定之意，詳下。

<sup>75</sup> 張君勱，〈國憲議〉，頁84-86；並參見：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收入：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下冊（台北：學生書局，1981），頁967-970。

漸趨於比較明確——即令立場也是相當曖昧的。

早先，他認為《威瑪憲法》體制既明白承認「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之大原則」，而於公共利益所關的土地及大生產事業「則國家得根據法律，行使其收歸國有」，他以為這正是「個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調和」，極力推崇《威瑪憲法》體制實有社會革命的精神<sup>76</sup>。

稍後，他則以為「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是社會主義之精神，「故重社會公道，而限制個人之自由；故廢私有財產，而代以社會所有制；故去財產承繼而以遺產歸之國有；故化私人營業而歸諸國有」<sup>77</sup>。但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卻也一樣對能將「個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兼容並包」的《威瑪憲法》體制推崇備至，「生計生活之秩序以公道為原則，而同時則曰工商之自由以法律保證之；既承認私有財產矣，而同時則曰為國（圖）公益計，可沒收之」<sup>78</sup>。

他確是意識到個體與群體利益二者的衝突，可以在憲政架構中尋得調和之道。但是，在這樣的體制\架構下，二者之間產生衝突時，以孰為先？判準何在？他沒有明確的說明，或許是並未意識到個體與群體優位性選擇此一問題的潛在可能，只看見了表象的調和之道。

然則，個體與群體優位性的選擇，卻是談論、建構社會主義所不能避免的問題。在稍後的《國憲議》中，張君勱即有這樣的明白表示：「一切政制上之社會公道與個人自由，……缺一不可者也。」但由於時代變遷，景狀各殊，社會公道與個人自由，「自隨時代而轉移」而各有所重，是以，在憲法中「自應留此兩要素，以為自由舒展之地」<sup>79</sup>。張君勱把選擇權付諸時空環境的變易。然則他自身的立場何在？他只提出了調和觀點來做回應，雖嫌混沌，卻也顯示他認識上的進展與面臨此一問題挑戰時的一種回

<sup>76</sup> 張君勱，〈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2：3，頁8-9。

<sup>77</sup> 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4。

<sup>78</sup> 張君勱就《威瑪憲法》中調和「個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條文製表對比，以論證此一觀點，見：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4-8，並參見：《國憲議》，頁86-89。

<sup>79</sup> 張君勱，〈國憲議〉，頁90。

應方式<sup>80</sup>。

### (三) 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大體而論，在對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過程的看法方面，張君勳的觀點一直是相當明確的：他反對列寧式的強力爲之，而推崇德國「真酌濟得平之道，世界所當取法」<sup>81</sup>。

蘇聯是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廣義的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第一個實驗場<sup>82</sup>，張君勳曾以她的經驗爲例證提出社會主義的界說：

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真精神，不外乎土地國有與生產機關之國有，此二者之不行，而欲冒公產與社會主義之名，斷斷不可<sup>83</sup>。這種認爲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對於土地與生產機關的「國有」——也就是從「所有制（權）」問題來思考社會主義——的思惟，可以說淵源已久<sup>84</sup>。不過，張君勳當時注意的只是土地與生產機關（尤其是大工業）的「國有」、「社會所有」問題。不過，這時候他對「國有」、「社會所有」的意義與區別還不是很明確。他這段論議正可以略窺一斑：

以吾所見，則全國一切工業盡歸國有，以中央官廳主持之，人民生產之業視爲一官樣文章，則其弊害所屆，必有甚於私有資本主義者。此則德人所以提倡公私混合生計說（Gemischte Wirtschaft）與限於能抵抗資本家之專橫範圍內之大工業部份國有論也。

<sup>80</sup> 薛化元曾宏觀地指出，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張君勳在「九一八事變」到中日戰爭期間集體主義思想的色彩最濃，而在1920年至「九一八事變」前與1941年後，則以個體的優位性較爲明顯。但是，終極張君勳的思想仍然存在著個體與集體的矛盾，參見：薛化元，《張君勳思想研究》，頁120-124。

<sup>81</sup> 張君勳，〈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頁41。

<sup>82</sup> 張君勳即謂：「自有馬克思之學說，其試行之者，以俄爲首」，見：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71。

<sup>83</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67。

<sup>84</sup> 參看：曹之虎，《論所有制——論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同時，他又以為蘇聯式的國有化政策是有影響的，英國煤礦國有正在「發動」，德國煤炭電氣社會所有將成法案，所以，他說：

國有問題，已成實際政策。其方法程度，則各國自不能盡同。要之，皆因俄人之蹶起而世界長其智識也<sup>85</sup>。

由此可見，張君勳對「國有」、「社會所有」的理解是混淆的，但隨著對蘇、德憲法的研究，他的認知便逐漸明確，並嘗試區分二者的不同。

在評述《威瑪憲法》體制關於這方面的規擬與實際做為後，張君勳對「國有」與「社會所有」之界說已有比較明確的區分認知，他的看法是：

國有與社會所有，其精神各異。國有者，由政府所有而管理之耳；社會所有者，其企業屬諸社會，故合工主，工人，消費者三階級而共同管理之<sup>86</sup>。

藉由對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的評述與條文的譯介<sup>87</sup>，張君勳即以〈煤礦所有法草案〉的規擬為例證，對「國有」與「社會所有」更做出這樣的區分，顯示他的認知益趨明確，更能提出比較好的區分判準<sup>88</sup>：

	國有事業	社會所有事業
與全社會之關係	以國家資本代無數小資本家，故仍不免工主工人對抗之形勢。	合生產者勞動者消費者而共同管理之，故自無勞動資本之爭。
任事者	國有事業在政府手中，其服務者為官吏。	社會所有事業離政府而獨立，其服務者為私人，且出於本自治團體之選舉。

張君勳亦指出「國有」與「社會所有」的社會形構作用亦大有出入：

	國有事業	社會所有事業
與全社會之關係	以國家資本代無數小資本家，故仍不免工主工人對抗之形勢。	合生產者勞動者消費者而共同管理之，故自無勞動資本之爭。

<sup>85</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71。

<sup>86</sup> 張君勳，〈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7-8。

<sup>87</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3-27。

<sup>88</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22。

任事者	國有事業在政府手中，其服務者為官吏。	社會所有事業離政府而獨立，其服務者為私人，且出於本自治團體之選舉。
-----	--------------------	-----------------------------------

張君勳既提出了區分，但在實踐上，也應該思索「社會所有」之內容與條件，他有這樣的闡釋：

一、「土地與生產機關之公有」：主要指的是造成「貧富懸絕」之原因的「土地大森林也，交通機關如電報鐵路也，種種大工業」應皆歸之公有，個人惟有「應於其勞力之所入，則工價是已」。

二、「公共管理」，即或以國家或是以地方團體乃至於以單項工業組成自治團體，「管理之權，以生產者、消費者、工主、工人、國家共分之，而利益所入，則歸之於全國」。

三、「以利益分配於公眾」，事業盈餘所得，除維持事業本身維持或擴張所需外，「首先受分配之益者，則為管理者與工人」，次為公共福利事務（如教育、養老金等）之所用<sup>89</sup>。

當然，社會所有之對象也有其限定，特別由於歷史經驗證明既有的國有\社會所有不見得是理想的：例如擾民，生產減少，官僚視之為例行公事，不能發展人民之自發力等等<sup>90</sup>。而且，就在西方歐美國家也有人據此等理由，因之站在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sup>91</sup>。

張君勳即說，「故言社會主義者，所常深思熟慮者，則何種生產事業適於公有」，而「於此各國社會黨有一共通之論，則以為適於公有者無如已集中之大工業大地主之土地是已」。他更藉由申說大工業之公有必不蹈覆車之所由，從而釋明「社會所有」的理想在現實世界具體落實的可能性<sup>92</sup>。

這樣，在張君勳的論釋中，「社會所有」論，成為他這個階段在理論

<sup>89</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6-17。

<sup>90</sup> 張君勳，〈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71。

<sup>91</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5。

<sup>92</sup> 張君勳是以工業發展已趨壟斷之景勢與股份公司之出現為例，說明即令大工業已社會化，但未必即導至生產減少及經營不力的困局，參見：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7-18。

上對社會主義的最後定見，那些高談保護工人權益、工人保險制度、均分土地、利益分潤制（Profit-sharing）、讓工人參與管理諸如此類的議論，都不能稱之社會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所謂社會主義者安在乎？曰社會所有而已<sup>93</sup>。

但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絕對不僅止於對經濟範疇問題的解決，還伴隨著其他層面的問題，尤其是實踐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與途徑問題，也成為張君勳關懷、思考的課題。俄、德兩國的差異，則為他的思索提供了對比，成為他自己做出選擇的依據。

照張君勳的觀察，在蘇聯的列寧政府成立前，「所謂社會革命者，但有生計的條件，則土地與生產機關國有是矣」，而在此之後「又生政治的條件，則蘇維埃政治組織是矣」<sup>94</sup>。德國的發展方向亦復如是，「德之革命黨，浸潤於俄國蘇維埃之學說者已非一日」<sup>95</sup>，社會黨人內部對與伴隨著走上社會主義之路的政治體制亦有爭論<sup>96</sup>。

張君勳自稱，中文世界以「蘇維埃」譯“Soviet”一辭，他首開其端<sup>97</sup>。至於他對蘇維埃這個辭彙實際涵義的理解，有一個變化過程，但是，在一時之間，他的表述頗為混亂。

早先，張君勳雖已有蘇維埃做為蘇聯政府體制僅限於一階級（無產階級）參與的認識，表示實在不能贊同之意<sup>98</sup>，但也一度將蘇維埃看成是比西方巴力門體制更為理想的一種政治體制，說這是蘇聯政府「所行之統治方法」，是列寧不滿於代議政治所創設出來的<sup>99</sup>，德國、意大利都有擁護者，「蘇維埃之為歐洲社會所頌禱者若是，其必日漸推行，殆無疑義矣！」因

<sup>93</sup> 張君勳，〈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頁15-16。

<sup>94</sup> 張君勳，〈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8。

<sup>95</sup> 張君勳，〈德國革命論（續）〉，《解放與改造》，2：4，頁29。

<sup>96</sup> 參見本文註53、註54。

<sup>97</sup> 張君勳，〈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頁20。

<sup>98</sup> 張君勳，〈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頁41。

<sup>99</sup> 張君勳在此引譯了列寧《國家與革命》的段落以說明其涵義（參照本文註61）；在他處，張君勳說：「蓋俄人以為昔之代議政治為資本階級之代表，故廢之而代以蘇維埃」，見：張君勳，〈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頁41。

爲這種體制在形式上雖與各國巴力門體制不同，但其實質，在那時的張君勱看來：

工人之參與工廠管理，工人會議之參與立法……殆為歐洲公認之原則，雖其組織與俄之以蘇維埃為惟一統治機關者固不相同，然其精神則無二致。如是，今後之政治，其殆巴力門與蘇維埃之相濟為用乎？其殆巴力門與蘇維埃之蟬蛻乎？<sup>100</sup>

參照他已有不能贊同蘇維埃之意，他這段表述看來，顯示張君勱的理解是相當混亂的。所以他又有這樣的看法，認爲如英之自由、保守黨然，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亦是政黨，以爲蘇維埃是議會，「皆出於選舉，皆取多數決者也」，「民主之中，不論爲蘇維埃，與資產階級，要不能無政黨」<sup>101</sup>！竟做出了與西方國家政制下等同的論述——當然，理想的蘇維埃應該是這樣的，但是，從當時的脈絡中來看，蘇維埃「實貧民獨裁之統治機關焉」<sup>102</sup>，更何況，張君勱本人在理解「貧民獨裁」<sup>103</sup>這個辭彙的意義後，一直站在反對的立場呢！

張君勱很早就不能認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雖然，他知道在列寧那兒是將「無產階級專政」視爲在國家消失前的「不得以而爲之」之舉<sup>104</sup>，

<sup>100</sup> 張君勱，〈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2，頁51-53。

<sup>101</sup> 張君勱，〈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4：2，頁8、頁9。

<sup>102</sup> 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8。

<sup>103</sup> 「貧民獨裁」這個辭彙，是張君勱在當時對於「無產階級專政」（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proletarian dictatorship）一辭的翻譯，最早見諸：張君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解放與改造》，1：6，頁38。

<sup>104</sup> 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8；列寧說，「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論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存在了」，易言之，當資本家已經消失，階級不再存在（也就是社會各成員在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差別了）的時候，也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因為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需要鎮壓，也沒有暴力了。而人們也就擺脫了由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一切貪婪、卑鄙，「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數千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地遵守這些規則，而不而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見：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243-249。

但是，他就是無法認同這種即使是「不得以而爲之」的做爲。

恰也正是德國式的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給張君勳對照的樣本<sup>105</sup>，更讓他不能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能引領至社會主義之路有信心。

他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理念，雖是高揚勞工地位而致，但「推尊之過度，而至於擯斥其他國民，則大非平等之義」<sup>106</sup>；且將民主精神剝奪殆盡，利害能否相償，不無疑問。而以其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等自由，更致「民氣鬱而不舒」，將妨礙「人民自由自發之精神與能力」的培育<sup>107</sup>。況且，在與《威瑪憲法》體制比較對照下，在這種極富彈性的民主憲法體制下，透過立法程序，可以容納不同的政治、經濟立場人士的要求的<sup>108</sup>。這樣，在張君勳看來，蘇維埃加「無產階級專政」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實在遠遠不如德國式道路<sup>109</sup>。

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實踐時，張君勳認爲，手段也是必需列入考量的。像社會主義這樣的理想，也不能以其目的正確，因此就證成了所採取的手段便也必然正當；而且，社會改造，取捨之間利害重大，若有誤差，難能挽回<sup>110</sup>，必當再三措意。在他看來，列寧式的遽以暴力進行土地國有與生產機關之國有，非單未曾賠償，亦未經議會立法而由國家強力沒收，在法

<sup>105</sup> 張君勳在〈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一文中即有此表白，而在〈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一文中更舉出6點對比，主要論點在於可以法律與非法律手段來估衡俄式與德式路向的差異，見：張君勳，〈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7-8。

<sup>106</sup> 張君勳，〈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8。

<sup>107</sup> 張君勳，〈懸擬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頁7。

<sup>108</sup> 在張君勳看來，即使是有俄式蘇維埃體制入憲與全面社會所有主張的獨立社民黨，他們的主張在《威瑪憲法》體制中「誠依立法上之手段」，「又何患不能達」，見：張君勳，〈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2：11，頁12。

<sup>109</sup> 當然，張君勳也還認爲這也是由於德國社會民主傳統「根基之深厚，履踐之篤實」而致之，其「勇猛精進，誠不如俄，然其腳踏實地，遠非俄所能及」，所以他甚至說即使俄國去其「無產階級專政」而恢復人民自由，「其所成就，吾殆不能必其能比隆德國焉」，見：張君勳，〈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3，頁5。

<sup>110</sup> 張君勳，〈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5。

律及程序問題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列寧於此亦「無辭以自解」<sup>111</sup>。

總結言之，在這個階段的張君勱，對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認識，一方面指出它的理想性格，對於它的具體界說，也透過既成的俄式體制與德式道路的比較，逐漸趨於完整。雖然，後人的後知之明，可以對他的認知和界說做出深入或實質的挑戰與質疑，但是誰都不能否定他不斷完善、深化自己的認識與思路，好讓追尋、構築理想的存在處境能夠落實的努力。

## 五· 結論：一個初步的定位

總結以上的析論，筆者以為，大體言之，這個階段的張君勱，對於社會主義體制之認識與論述呈顯出來的觀點，與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一書<sup>112</sup>批判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式社會主義之路，同列寧進行「文字戰爭」的考茨基，頗為一致。

總結地看，考茨基所指稱的無產階級專政，係作為一種多數統治——即其所定義的民主主義——的狀態而存在；它的出現，在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治權力後，以它的想法，用民主主義的形式，憑它們成熟的意識——考茨基認為即是它自身的利益同社會的總利益相一致——來塑造社會的一種狀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sup>113</sup>。因此，在考茨基看來，對於蘇維埃規定「以有用的生產和勞動獲得他們的生活者」才有投票權，顯然違背民主主義的原則，益發證明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一種政府形式的原則而希望藉此過渡到社會主義，顯然只會是一小撮人的專政<sup>114</sup>。

<sup>111</sup> 張君勱，〈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頁67。

<sup>112</sup> 參見本文註36。

<sup>113</sup> Gary P. Steenson, *Karl Kartsky: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 208-209。

<sup>114</sup> 考茨基，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頁42-47；在此，蘇聯的異議派史家羅易·麥德菲迭夫（Roy Medvedev）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他認為，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的使用，應當放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所遭受的內外窘迫情勢這個脈絡中來看待。當時在俄羅斯占少數人口的勞工成為布黨的主力，受過較好教育及比較有政治頭腦的勞工乃迅速成為政機器的核心，無產階級專政，乃成為建立社會主義經

考茨基又針對布爾什維克政權建立後的狀況，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他認為，由於蘇維埃在實質上取消了普選，不能稱之為民主主義的；其次，在政策上，由於俄國本身的經濟依賴農業為基礎，為著鞏固政權，布爾什維克必須向農民讓步<sup>115</sup>，結果最後由於農民私有財產權之確保，反而證實了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意義。他的論述終歸結於，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前途在於民主主義，因為民主主義對每一個人——不管他屬於那個階級或那個政黨——都承認有平等的權利與分有一切政權；由少數無產階級遂行的專政，以及由此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sup>116</sup>。

當然，這個時候的張君勱，不論是社會主義的理論水準，亦或是個人的政治歷練，較諸考茨基，誠瞠乎其後。但是，張君勱在這個階段對社會主義體制之認識與論述呈顯出來的觀點和立場：頌揚德國式道路，反對蘇維埃加「無產階級專政」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已然預示，他的社會主義論之內涵與立場定位，和考茨基思想立場的趨同性：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巴力門之路（a parliamentary road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ism）。張君勱持這一立場的種子，就此潛幽深埋，他日後的社會主義論，基本上未曾逾越這樣的立場。可是，如果從列寧式的「正統」觀點來看，那麼，張君勱會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籤<sup>117</sup>，就如同自以為站在「極端馬克思派」立場的蔡和森<sup>118</sup>的批判，張君勱是：

以中產階級的反動眼光及賢人眼光觀察俄國革命，對於德叛逆社會黨（即多數黨）一唱而三嘆。他對於中國主張的八條，不牛不馬，

---

濟體制的理論基礎，參見：R. Medvedev, trans. by A. D. P. Briggs, *Leninism & Western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4), p. 32。

<sup>115</sup> 張君勱也觀察到這一點，見：張君勱，〈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11；但必需指出，這是指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決議，是在1921年列寧全面推動「新經濟政策」以前的事，參見：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列寧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596-599。

<sup>116</sup> 考茨基，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頁54-72。

<sup>117</sup> 當然，這要做更詳細的對比，先擬存而不論。

<sup>118</sup> 蔡和森，〈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蔡和森文集》，頁74。

這種冬烘頭腦，很足誤人<sup>119</sup>。

對比於張君勱的意見，蔡和森以爲：

階級戰爭的結果，必為階級專政，不專政不能改造社會、保護革命<sup>120</sup>。然而，張君勱希望的則是在諸多問題應當化解，繁雜面向亟應思考的社會主義之路上，社會主義理念，社會革命之理想，不該像宗教一樣成爲讓教主義陶教徒的「煙土披里純」(inspiration)，他認爲，不應以感情，厥以由理性而做爲指引前行的人人共由之路<sup>121</sup>，才是最需要的。這樣的態度，從張君勱申論社會主義對中國的意義，並也構思如何落實在他自己活動的中國現實舞臺中，將更爲明顯<sup>122</sup>。然則，歷史已經證明，張君勱式的道路，在他肉體存在的歲月中，並未曾平坦地開展。甚至於就在他與同志（例如，張東蓀）在這個方始走上社會主義之路的階段，中國境內就爆發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與中國現實之間關聯所在的論戰，參戰成員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一般傾心於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sup>123</sup>，當時在德國生活的張君勱就已嚐到被批判的滋味了<sup>124</sup>！

不過，正如張君勱晚年時期對於考茨基嘗試就馬克思的原典進行分疏，究竟馬克思是怎麼談論「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辭彙的努力<sup>125</sup>，所做的

<sup>119</sup> 蔡和森，〈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頁64。

<sup>120</sup> 蔡和森，〈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頁64-65。

<sup>121</sup> 張君勱，〈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頁2，頁6。

<sup>122</sup> 例如，張君勱不以為「無產階級專政」適於中國，他認爲，「人民自由自發之精神與能力」乃是國之至寶，歐亞高下有別之由即在於斯。若仿「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獨擅大政，貪私利以奔走者，遍於全國，公產制之成績毫不可見；而並此破碎不堪之舊文明，恐亦將掃地無餘矣」。所以他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斷不適於中國（見：張君勱，〈懸擬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頁7）；不過，這必然要具體地檢視張君勱從社會主義角度對中國現實的思索與規畫（或是以薛化元的論點：張君勱「關於國家基本藍圖的設計」），暫存而不論。

<sup>123</sup> 關於這場論戰的初步研究成果，參見：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但本書有可再檢討之處，如其結論竟是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應走的路」，意識形態掛帥的意味相當濃厚。

<sup>124</sup> 參見：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第3章。

<sup>125</sup> 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辭彙，是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一書中首先使用的，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一段論述，則是討論這個辭彙的最主要來源：「在資本主義社會

評論一樣：

革命乃槍林彈雨的事，不可依馬氏文字定其孰為多數，孰為少數，孰為合法，孰為不合法。此中分辨，但可求之於尊重法治的國家，何能責之以暴力爭勝敗的革命黨人<sup>126</sup>。

可惜的是，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走的卻正是槍林彈雨的革命之路，「武器的批判」遠比「批判的武器」還要來得更具優位與更為重要。這樣，1949年以後被迫離開中國大陸的張君勱，不但被形容為「走向了毀滅」<sup>127</sup>，還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籤——儘管他可能只是傾心於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格，透過對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認識，藉以構擬存在處境的未來理想藍圖的知識分子。也就從這個階段為起點，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構成張君勱此後的思想道路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

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21）；考茨基及列寧都引用這一段話以證成自己的觀點（考茨基，鄭學稼〔譯〕，《無產階級專政》，頁23；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頁244）；關於二者之間的爭論對立，參見：潘光哲，〈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與列寧對「向社會主義過渡」之爭論〉，《反思》第2期（台北：張君勱學會，1991年夏季出版），頁23-45。

<sup>126</sup> 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131。

<sup>127</sup> 許紀霖，《無窮的困惑——近代中國兩個知識者的歷史旅程》（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頁273。

## Carsun Chang's Observations on Socialism(1919-1922)

Kwang-che Pan

Carsun Chang ( Zhang Junmai: 張君勳, 1886-1969 ) is a famous political activist, a socialist, and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 in detail his views and observations on socialist ideas and establishments from 1919 to 1922.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Chang became a socialist and the ways he gained acceptance of socialist ideas, and his 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s of socialism and how to make socialism a reality, finally, the author compares Chang's critique of the Soviet ways of socialist establishment led by Lenin, with Karl Kautsky's,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that Chang and Kautsky shared the same position: both insisted on "a parliamentary road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ism"

**Key Words:** Carsun Chang, Socialism, Karl Kautsky



